

瑶族文化论

云南人民出版社

陈斌 著



云南民族研究所编

K203.157
C364
1

瑶族

文化
论

陈斌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646.2.3

〈滇〉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朱 珊

封面设计：杨弼睿

瑶 族 文 化 论 云南民族研究所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125 字数：126000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222-01245-1/G·129 定 价：3.60元

序

陈斌博士的《瑶族文化论》一书，对瑶族文化从历史到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概说，把大量的事实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使分散的材料构成了玲珑剔透的宝物，在发掘和整理瑶族文化的广阔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

十多年来，陈斌在学术上一直和我保持密切的接触。他年青有为，勤奋好学，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阅读了大量民族历史方面的书籍，并数度深入到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对少数民族有丰富的感性知识，尤其是对瑶族。陈斌的博士论文《明清时期“山瑶”与“民瑶”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给今日写成的《瑶族文化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年以后，陈斌写出这本《瑶族文化论》，可以说是瓜熟蒂落了。当然，书中必然有不少的缺点和不足，这对一个年青的学者来说是在所难免的。但对我来说，不能不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尤 中 1992年10月于云南大学

导 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56个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内涵如此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只有在对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进行全方位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宏观地把握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

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渊源甚古的民族。早在距今数千年前，与瑶族有着渊源关系的“九黎”、“三苗”、“荆蛮”，就已在广袤的江汉地区生息、繁衍着。并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创造了灿烂的“童年文化”。秦、汉之际，以“武陵蛮”、“长沙蛮”、“五溪蛮”见称的瑶族先民群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曾与周围的其他民族群体有过广泛的接触，经过相互间不断地分化组合，到南北朝时期，瑶族便开始从盘瓠集团中单独分化出来，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其初始的民族名称为“莫徭”，到宋朝时，去“莫”而仅称“徭”，并一直相沿至近现代。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将“徭”、“瑶”等书面名统一规范为“瑶”。

瑶族还是一个以迁徙频繁，散布面广而著称的民族。先秦时期，瑶族先民生息在江汉平原的腹地，《史记·五帝本纪》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秦汉之际，瑶族先民主要居住在长沙郡、武陵郡内，但在秦、汉封建王朝的压力下，已开始了南下的趋向。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期间，大量的瑶族南渡长江、洞庭湖，向华南、西南的山区迁

徙。宋、元两朝，瑶族继续南迁，不断深入两广腹地。入明以后，两广已成了瑶族的主要聚居区。清代，以两广为本营的瑶族，又继续向西南迁徙，进入贵州、云南境内。其中为数不少的人口，更越过国界，进入越南、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本世纪70—80年代，由于受东南亚战乱的影响，部分瑶族难民又飘洋过海，迁到法国、美国和加拿大定居。

因此，近十年来，以其悠久、深邃、璀璨的传统文化而蜚声世界的瑶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可以说，瑶族研究已成为当前一个国际性的热门课题。尤其是国际瑶族研究会的成立，以及先后在香港、法国、中国召开的国际瑶族研究会，更推动了瑶族研究向纵深发展。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内，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从宏观上全方位地考察和研究瑶族传统文化的论著尚属少见。致使人们对瑶族文化的了解，始终是管中窥豹，仅见一斑。因此，笔者不揣简陋，力图以史论结合的形式，对瑶族古老的文化遗产，作认真地清理和研究，以期能于描绘它的真实面貌，评论它的功过得失，从而促使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重新焕发其青春魅力。

当然，限于笔者的功力，书中的舛误之处在所难免，惟盼读者和同仁们不吝赐教。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走向世界的足迹	(1)
第一节 瑶族溯源	(1)
一、“三苗”兴衰	(1)
二、“武陵蛮”发微	(7)
三、瑶族共同体的形成	(11)
第二节 迁徙之路	(12)
一、“窜三苗于三危”	(12)
二、“飘洋过海”	(13)
三、走向世界	(16)
第三节 瑶族支系及其分布概说	(18)
一、瑶族他称	(18)
二、瑶族自称	(20)
第二章 游耕文化	(24)
第一节 游耕文化的摇篮	(24)
一、背负大山的民族	(24)
二、瑶山丰富的自然资源	(28)
第二节 游耕文化丛	(29)
一、互为补充的产业结构	(30)
二、多元一体的所有制结构	(42)
三、多相共存的分配结构	(46)
第三章 制度文化纵横谈	(52)

第一节 从血缘组织到地域组织·····	(52)
一、婚姻——氏族的纽带·····	(52)
二、农村公社——过渡性的社会组织·····	(56)
第二节 具有瑶族特色的土司制度·····	(59)
一、瑶族地区土司制度概述·····	(60)
二、瑶族土司制度的特点·····	(64)
第三节 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保甲制·····	(68)
第四章 闪烁在神话王国中的民族精神 ·····	(72)
第一节 盘瓠神话——民族命运的印记·····	(72)
一、盘瓠神话主题及其产生时代·····	(72)
二、盘瓠神话的传承方式·····	(75)
三、盘瓠神话的社会功能·····	(81)
第二节 盘古神话——宇宙观的原始摹绘·····	(81)
一、盘古创世神话的全方位透视·····	(84)
二、盘古神话的族属·····	(88)
第五章 扑朔迷离的鬼神世界 ·····	(93)
第一节 步入迷津的世界观·····	(93)
一、灵魂充斥的世界·····	(93)
二、图腾崇拜·····	(96)
三、信仰道教·····	(100)
第二节 走进生活的宗教文化·····	(101)
一、宗教意识的世俗化·····	(101)
二、宗教禁忌·····	(105)
第六章 前喻文化的导向功能 ·····	(109)
第一节 物态文化的传承·····	(109)
一、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	(110)

二、乐器·····	(113)
三、服饰·····	(115)
四、民居建筑·····	(117)
第二节 道德规范的沿袭·····	(118)
一、文化传统的认知途径·····	(119)
二、道德规范的沿袭·····	(121)
第七章 民俗与社会·····	(127)
第一节 瑶族传统民俗事象阐释·····	(127)
一、神判·····	(127)
二、拜寄·····	(132)
三、插青·····	(134)
四、放信·····	(135)
五、踏摇·····	(135)
第二节 瑶族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	(136)
一、历史性的特征·····	(137)
二、延续性的特征·····	(138)
三、社会性的特征·····	(140)
第八章 瑶族民间文学巡礼·····	(142)
第一节 歌谣·故事——瑶族民间文学的双翼 ·····	(142)
一、歌堂诗——瑶族的镜子·····	(142)
二、传说故事——瑶族历史的呐喊·····	(148)
第二节 瑶族民间文学价值举隅·····	(150)
一、《海南信歌》的史料价值·····	(150)
二、千家峒传说的原型分析·····	(152)
第九章 冲撞与合流——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161)

第一节 从封闭到开放的历程·····	(161)
一、瑶汉民族联系的加强·····	(162)
二、《过山榜》——汉文化渐渍的结晶·····	(166)
第二节 “非瑶”意识与民族融合·····	(170)
一、“民瑶”与汉族的融合·····	(170)
二、瑶汉民族融合的特点·····	(175)
附录：瑶族历史大事年表·····	(178)
后记·····	(185)

第一章 走向世界的足迹

第一节 瑶族溯源

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在包括云南、四川、贵州、西藏、广西乃至湘西地区在内的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着分属不同系统的近30个少数民族。瑶族是西南民族中历史悠久、渊源最古的民族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瑶族的族源问题争论不休，至今仍未达成共识。因此，对瑶族源流的考绎，便成为我们研究瑶族文化的滥觞。

一、“三苗”兴衰

由氏族、胞族、部落而形成民族，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本规律。但我们在勾稽史籍时，往往会发现，由于文献资料的阙如，细致描绘一个民族演化形成的“系统图”是比较困难的。而许多氏族已被时间从古代史中抹掉痕迹这一历史事实，又常常使学者们在民族族源问题的研究上步入迷津。因此，我们只有根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和古代人残留于地下的

遗迹，来艰难地寻找瑶族祖先的脚印。

在传说中的英雄时代，我国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除了中原黄河流域的炎、黄世系以外，四周尚有传统习惯上所称的“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与“东夷”有着密切关系的“九黎”部落，大致在与共工氏的战争中退到了江汉之间^①。其后，他们凭借江汉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实力迅速增强，成为雄据祖国南方的强大部落群体。《国语·楚语》说：

“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

此外，《史记·五帝本纪》也说：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正，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所谓“九黎”之“九”，以及后来“三苗”之“三”，皆是虚指，言其众多。相传蚩尤有兄弟81人，或曰72人，即有81或72个氏族。众多的氏族又组成部落联盟，蚩尤就是这一人多势众，处在不断分化组合中的部落联盟的最大首领^②。

黄帝时期的“九黎”，至尧、舜时期发展为强盛的“三苗”族群。这一支庞大的势力，主要分布在江汉地区。《战国策·魏策一》记吴起说：

“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又《韩非子》云：

“三苗之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

彭蠡即今江西鄱阳湖，洞庭湖则古今同名。两湖皆位处江汉腹地。所以说“九黎”、“三苗”主要分布在江汉地区，即今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而且，这一说法已为江汉地区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建国以来，已发掘的属于长江中游一带的主要新石器时代文化，先后有大溪文化（公元前3990±260——前3380±145年），屈家岭文化（公元前2875±220——前2635±150年），青龙泉三期文化（公元前2400年前后一段时期）。大溪文化首先发现于四川巫山长江南岸大溪，长江瞿塘峡一带，随后在湖北秭归、宜昌、宜都、枝江、江陵、湖南澧县、安乡等地也都有发现。由开始仅知的川东鄂西，扩大到了湖北中部，南边已达湘北洞庭湖周围^③。总之，大溪文化是四川极东部和两湖地区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墓葬中的随葬品来看，估计大溪文化晚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以后，大溪文化没能在四川盆地发展起来，却发展成了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分布在河湖密布的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的人们，已主要从事水稻（粳稻）的种植，制陶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发现的与父权制有关的求育崇拜物——男性生殖器陶祖来看，其社会已处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而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青龙泉三期文化，从已发掘的墓葬来看，人们的贫富分化正在加剧，正值阶级社会的前夜。

江汉地区具有自身发展序列的上述新石器文化，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种典型代表。中间虽曾受到过仰韶

文化的影响，但其文化内涵却未改变，这是构成楚文化的早期因素之一。因此，可以认为：这些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是族系纷繁、部落众多的“九黎”、“三苗”。

创造了灿烂的人类童年文化的“九黎”、“三苗”族群，在生产发展，人口增多，部落组织日益强大后，在蚩尤的率领下，不断北上与诸夏部落联盟发生抗争。《尚书·吕刑》说：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
平民。”

《逸周书·尝麦解》说：

“蚩尤乃逐（赤）帝，战于涿瀋之河
（一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愆，乃
诎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对于这次战争的过程，《山海经·大荒北经》还作了带有神话色彩的记述：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
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
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
止，遂杀蚩尤。”

涿瀋之战的失败，虽使“九黎”部落联盟的北进意图遭到扼制，但他们仍以江汉地区为腹地，与中原诸夏部落相颀颔。

其后，在“九黎”故地上兴起的“三苗”部落联盟，又同以尧、舜、禹为首的中原华夏族集团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吕氏春秋·召类》说：

“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

苗民，更易其俗。”

《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

“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
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
国。”

此后，《韩非子·五蠹》称：“当舜之时，有苗不服”，
《淮南子·修务训》说：“（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
《墨子·非攻下》又说：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
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往有苗。四（雷）电
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扼矢有
苗之将，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三苗”部落联盟与诸夏部落联盟进行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战争，正反映了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这一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特点。恩格斯曾指出：“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④。”我国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正值历史上的英雄时代。以部落联盟各级军事首领为首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战争，致使各民族、部落间的分布格局被打破。不同地区、不同部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促使部族间的混杂、分化、组合不断加剧。于是，一些旧的族称消亡了，经过整合后的新的人们共同体不断出现。

从商周到春秋时期，继“三苗”之后而“居国南乡”的“荆蛮”，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人口也不断增多，伴随着战争而进行的与中原各部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诗·商颂·殷武》说：“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架（深）入其阻，哀荆之旅。”《后汉书

· 南蛮传》也追述说：

“（荆蛮）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宣王中兴（公元前827——前782年），乃命方叔南伐蛮方，诗人所谓蛮荆来威者。又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明其党众繁多，是以抗敌诸夏也。”

显然，这一时间阶段内的“荆蛮”、“荆楚”，是包括苗、瑶族先民和楚族在内的族落群体。《国语·晋语八》说：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莛，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

而楚人也常以“蛮夷”自居。据《史记·楚世家》载，周成王（公元前1115年——前1091年）曾封熊绎于楚蛮。至熊绎的四世孙熊渠时仍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到楚武王时（公元前740年——前690年），以郢（今湖北江陵）为都的楚强盛起来，不仅侵吞了江汉间的小国，而且还向中原诸夏进攻。《史记·楚世家》说：

“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

这时的楚人，显然已以“蛮夷”中分化出来了，并具备了强大的实力，才产生了“欲观中国之政”的愿望。以后，楚人更不断北上，加入了大国争霸的行列，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时，曾一度饮马黄河，询问周室九鼎

的大小轻重。

楚族与华夏族的频繁接触，使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不断加强，仅从具有楚文化特征的楚式铜器上，便可看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也可看到楚文化的反影响^⑤。而文化的交流和交融，又使民族间的差异性缩小而共同性增长。这样，及至公元前222年，秦灭楚后，原“荆蛮”中的先进部分——楚族，便与中原的华夏族融合了，楚文化成了汉文化的主源之一。而“荆蛮”中落后的部分，经过与部分濮、越人口的分化组合后，则形成了槃瓠系统的部落集体。他们是近代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中苗族和瑶族的先民。

二、“武陵蛮”发微

秦、汉之际，槃瓠系统的部落群体，仍主要聚居在荆州地域内，只是称呼有所变更。秦于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夺取楚国的巫郡和江南地后，设置了黔中郡，生活在黔中郡内的槃瓠部落群体，被统称为“黔中蛮”。及至汉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黔中蛮”因而更名“武陵蛮”。又因武陵郡内有五溪，即雄溪、橘溪、无溪、酉溪、辰溪，且“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⑥。”

西汉初年的“五陵蛮”，社会生产已有所发展，其社会已处在“有邑君长”的原始社会末期。而且，西汉王朝已开始对部分“武陵蛮”征收赋税，《后汉书·南蛮传》说：“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賁布。”这实际上是保留其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而进行贡纳的征收，即所谓“羁縻而绥抚之”。这种剥削方式较为缓和，所以没有激